



Dangerous Nati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rom its Earliest Days to
the Dawn of the 20th Century

危险的国家^上

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

〔美〕罗伯特·卡根 (Robert Kagan) / 著

袁胜育 郭学堂 葛腾飞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危险的国家

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 ①

〔美〕罗伯特·卡根 (Robert Kagan) / 著

袁胜育 郭学堂 葛腾飞 / 译

**Dangerous Nati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rom its Earliest Days to
the Dawn of the 20th Centur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Robert kagan

Dangerous Nati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rom its Earliest Days to the
Dawn of the 20th Century

Copyright © 2006 by Robert Kaga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本书根据 Alfred A. Knopf 出版社 2006 年英文版译出

献给托尔

《独立宣言》的作者们为自由社会设立了一套所有人都熟悉和尊崇的基本准则：不断地期望、不断地付出辛劳，即便是从未圆满实现，也要不断地努力接近，并因此而不断地扩大和深化它的影响，增进所有地方、所有肤色、所有人的幸福和生活的价值。

——亚伯拉罕·林肯，1857年6月26日

序 言

1817年，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向国内报告说，“目睹了我们的人口和实力的巨大增长，欧洲普遍的感觉是，一旦我们联合起来，我们将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成员。因而他们希望——这也是他们满怀信心期待的——我们将不会长久地联合在一起”。^① 1819年，一位出访欧洲归来的国会议员报告说，与他交谈过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根深蒂固地认为我们是一个野心勃勃、侵略成性的民族”。^②

如果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得知，甚至当美国尚处在襁褓之中的时候，世界上许多人就将它视为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他们将感到十分吃惊。世人在提到美国革命前后几十年这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他们想到的往往是“孤立”、“不卷入”、“中立”之类的词语。正如新教牧师约翰·温索普（John Winthrop）的一句名言所说，早期美国人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为他人所效法的“山巅之城”。华盛顿的“告别演说”重申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孤立主义内核，反对承担外部的义务，表达了典型的美国愿望：希望置身于这个腐败世界之外。门罗主义则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孤立主义和与世隔绝的

① Adams to William Plumer, January 17, 1817, in Worthington Chauncey Ford, ed., *Writings of John Quincy Adams*, 7 vols. (1913; reprint,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8), 6: 143; Joseph Byrne Lockey, *Pan-Americanism: Its Beginnings* (New York: Macmillan, 1926), p. 159.

② John Quincy Adams, *Memoirs of John Quincy Adams, Comprising Portions of His Diary from 1795 to 1848*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875), 4: 437-39.



传统。诸如此类的说法也得到广泛认可。

然而，17 世纪、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人们却并不是这样来看美国人的。在北美大陆、在西半球、在欧洲，那里的民族和国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将美国人视为危险的。首要的原因，是他们的侵略性和看来似乎对领土和支配性影响力不知餍足的欲望。在 18 世纪 20 年代后期，一个墨西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是一个最为“野心勃勃的民族，毫无诚信，总是觊觎着邻国的土地”。^①自 17 世纪早期以来，在整个北美大陆一直遭到驱赶的印第安部落的人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不仅如此，先后被美国人从土地上驱离和从水道上赶走的西班牙人、法国人、俄罗斯人，还有英国人，同样也是这么看待这些被法国外交官形容为“人多势众”、“好战”和“不安分”的美国人的。这些野心勃勃的美国人是“一个可怕的敌人”。^②

但是，侵略性的领土扩张主义并非造成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在他人的眼中显得危险的唯一特质。美国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及其附带的似乎要吞噬掉其所触及的一切文化的自由主义和商业社会所构成的危险，如果不是甚至比前者更令人担忧，那也是与之旗鼓相当的。1794 年，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警告说，美国的人口和文化都“在寂静中推进和增殖”，“对西班牙人来说，其可怕的程度不亚于他们的武器”。^③

这个基于人类平等和天赋权利原则的共和国甫告成立，立即得到世界上许多人的赞美和祝贺。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却是忧虑重重的。西班牙驻巴黎大使评论道，“这个联邦共和国诞生时可

① J. Fred Rippy, *Rival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over Latin America, 1808 - 183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29), pp. 92 - 93.

② Secret Instructions for the Captain-General of Louisiana, November 26, 1802, quoted in Alexander DeConde, *This Affair of Louisiana* (New York: Scribner's, 1976), p. 150.

③ Baron de Carondelet, "Military Report on Louisiana and West Florida," November 24, 1794, quoted *ibid.*, pp. 57, 59.

谓一个侏儒”，“但它成长为巨人的那一天终将来到”。这位大使深信，这个国家可怕的力量源泉，在于它的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府，“信教的自由、在一片广袤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族群的便利，以及一个新政府的优势，将吸引大洋彼岸各个国家的农民和工匠。不出几年，我们将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个专横的巨人的存在”。^①

紧随美国革命之后的数十年里，革命的浪潮席卷大西洋，保守的君主制和专制制度的维护者越来越惊恐地注视着这些浪潮。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王子（Prince Klemens von Metternich）警告说：“如果这股邪恶学说和罪恶范例的祸水蔓延到整个美洲”，“我们政府的道德力量，以及使欧洲免于彻底瓦解的传统制度的命运将如何？”当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总统在1823年宣布后来广为人知的门罗主义之后，梅特涅担忧“我们眼见着成长和壮大的”美国人，已经“突然变得不再满足于现有的空间对其野心的桎梏……并以一种”与美国革命本身相比“更具挑衅性、一样毫无顾虑、危险程度不相上下的全新的反叛行为，使欧洲惊恐不安”。^②

这种美国人对自身的认知和其他人对它的认知之间的差别，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美国人一直珍视这样一种自我形象：天生是内向型的、超然物外的，只是偶尔地、断续性地冒险涉足世界事务，而且通常是对外部攻击或者是对所感受到的威胁作出反应。尽管经历了400年的持续扩张，越来越深地卷入世界事务，尽管进行了无数次战争、干涉和对外国领土的长期占领，这种自我认定的形象一直没有改变。这些事似乎只是个意外或者命运的非正常变故。即便是当美国已经上升到全球霸权地位，其触角和影响力席卷整个大陆而且漂洋过海的时候，美国人仍然深信他们的国

① Quoted in Norman A. Graebner,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Realist Appraisal from Franklin to McKinley*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1985), p. xxxii.

② Quoted in Bradford Perkin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I: *The Creation of a Republican Empire, 1776 - 186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8, 166.



家天然倾向于被动、漠不关心和与世隔绝。

这种自我意识的缺乏自有其优点。它有时使得世界上很多人更能容忍美国巨大的权力，因为一个对自身行为如此缺乏意识的国家，与一个有着扩张和征服蓝图的国家相比，可能显得危险性小一些。但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即美国人常常意识不到他们的扩张主义倾向——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战略的和文化的——碰撞和侵扰了其他族群和文化。当得知他人仇恨他们，对他们感到嫉妒，甚至对他们的力量 and 影响感到恐惧时，他们往往感到吃惊。因此，他们不能预见到他们视为正常的扩张行为将可能激起的针对他们的反应，有时是暴力性的反应。

这种自我意识的缺乏还以另外一种方式成为一个问题。美国人不仅常常看不到他们的行为可能激起的别人的反应，他们甚至不能准确地预见他们自己的反应。美国的历史就是由这个不断重复的意外所构成的，不仅对其他国家的行为感到吃惊，而且对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行为作出的回应感到吃惊。许多美国人深信，他们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大多数事情都不在乎，然而当事情发生后，他们却发现他们的确在乎。就像霍华德·霍克（Howard Hawks）导演的电影《逃亡》（*To Have and Have Not*）中，劳伦·巴克对汉弗雷·博格特所说的：“我知道，我知道，你对我要做什么默不作声——而一旦我做了，你又感到痛苦。”在 1944 年的那部电影中，出演博格特的哈里·摩根是走出孤立的一个孤立主义的美国的象征，而巴克的那句台词则可概括美国 400 年的对外政策。

总而言之，如果美国人能够更好地懂得他们自己、他们的国家和他们国家的历史，他们的境况就会更好，这尤其适用于美国早期对外政策的历史。在将美国视为一个孤立主义和被动的国家的神话的笼罩下，我们对美国 17 世纪、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对外政策的误解熟视无睹。这本书尝试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更多的不是关于一个孤立主义范例和“山巅之城”，而是关于扩张和野心、理想主义和物质主义。

目 录

(上)

序 言	1
第 1 章 第一批帝国主义者	1
“山巅之城”的神话：清教徒使命的美国化	1
扩张主义者的“使命”	9
“野蛮政策”	16
力量与独立	33
第 2 章 革命时期的外交政策	45
美国革命和美国外交政策普遍化	45
从强到弱：“实用理想主义”的诞生	63
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美国宪法》的出台	81
第 3 章 自由主义与扩张	88
洛克人和自由扩张	88
美国人的印第安人政策：权力和责任	101
通商与地中海	117



第 4 章 到告别演说及其以后	132
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内根源	132
告别演说：政治和政策	143
呼唤伟大	162
第 5 章 “和平的征服”	167
美国的扩张意识形态（1800 ~ 1823 年）	167
战争和民族主义	182
第 6 章 君主制年代的共和国	203
后拿破仑时代的美国与全球意识形态斗争	203
意识形态和扩张：走向门罗主义	217
第 7 章 蓄奴制的对外政策	232
蓄奴制的“国家利益”	232
进步的文明和“古老的文明”	241
密苏里危机	252
蓄奴制与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	258
无赖国家美国：南部与英国反蓄奴制征伐的对抗	273
得克萨斯的兼并：一个“南部问题”	283

(下)

第 8 章 天定命运	291
北方的遏制，南方的扩张：美国的双头外交政策	291
南部的热带帝国梦想	304
第 9 章 超越民族利益	320
北方的对外政策：超越奴隶制度	320
共和党和“金苹果”	337



第 10 章 战争与进步	346
“第二次美国革命”	346
共和党人的愿景	366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明”	375
第 11 章 权力到野心，野心到权利	395
安全的增强	395
从权力到野心：西半球	399
从实力到野心：亚洲和太平洋	425
从野心到实力：新海军	445
第 12 章 道德和霸权	468
民主的意见分歧	468
人道主义者的战争	490
参考文献	546
致谢	572

第 1 章

第一批帝国主义者

这个组织起来的国家耳聪目明，关心大众疾苦。她不是为自己而生，而是作为上帝管理人类的长官，为了维护人类的共同权利和自然法则而生。正如罗马人西塞罗（Cicero）^①所说，我们做的事情是为了保护这个世界，而不是要成为世界帝国。

——詹姆士·哈灵顿：《大洋国家》
(*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1656 年^②

“山巅之城”的神话：清教徒使命的美国化

对美国外交的历史、传统和本质的误解始于 17 世纪 30 年代定居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的大众形象。约翰·温索普曾充满希望地将马萨诸塞湾宗教领地描绘成“山巅之城”，^③而这被誉为美国的自

① 马库斯·T. 西塞罗（Marcus T. Cicero，公元前 106 ~ 前 43 年），古罗马共和国最杰出的演说家、教育家、哲学家，古典共和思想最优秀的代表，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天才作家。——译者注

② 詹姆士·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1611 ~ 1677 年），英国政治思想家，古典共和主义者，著有《大洋国家》一书。——译者注

③ “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一词出自《圣经》的《马太福音》第 5 章第 14 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在美国的殖民地时期，来自英格兰的清教徒相信上帝和他们有一个约定，并挑选他们领导地球上的其余国家。清教徒领袖之一约翰·温索普将这一理念比喻为“山巅之城”，即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社会必须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模范。——译者注



身形象，被广泛看做美国外交政策中具有主导性的孤立主义和“例外主义”趋势的一种生动象征。正如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默克（Frederick Merk）曾经说过的那样，清教徒的“使命”是“身体力行地超度旧的世界”，而且世世代代的美国人一直都认为这种“模范式的”目的是这个国家以纯正廉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原始使命：希望为这个世界树立一个榜样，但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① 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认为，美国思想中出现的这种理想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独特结合根植于清教徒的“乌托邦”愿望，需要与欧洲“分割”开来，同时切断“可能将欧洲疾病传播到美国的纽带”。^② 因此，真正的美国“使命”在本质上是孤立的、被动的，也是克制性的。正如默克所说，它是“理想主义的”和“自我否定的……是一种为制止各种侵略者扩张而战的力量”。^③

这一清教徒式的美国形象就如同虔诚的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④ 一样——只想独自留在她的自我满足的世界里——给人误

① Frederick Merk, *Manifest Destiny and Mission in American History: A Reinterpretation* (New York: Knopf, 1963), p. 3. 这是 1963 年默克所说的“使命”与“天命”之间的区别。35 年后，H. W. 布兰兹（H. W. Brands）在《美国欠了世界什么：为外交政策灵魂而战》（*What America Owes the World: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一书中对“模范人士”与“辩护人士”（vindicationists）加以区别。布兰兹把温索普划到了“模范人士”一类中。这种区别甚至在 21 世纪仍然在推动着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正确路线的辩论。

② Felix Gilbert, *To the Farewell Address: 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4.

③ Merk, *Manifest Destiny and Mission*, pp. 261 - 62.

④ 葛丽泰·嘉宝出生于 1909 年，是风靡好莱坞乃至整个世界的美国电影明星。她在好莱坞从影 19 年，从无声电影跨越到有声电影，一共拍摄了 27 部电影，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1949 年，她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永不再拍电影！晚年的嘉宝对自己作了总结：“我荒废了一生，现在要改变它已经晚了。我散步的目的是逃避现实。当独自一人时，我常想到自己过去的一切，有好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总之，我对这辈子是不满意的。”——译者注



导。首先，温索普所说的清教徒们并不是孤立主义者，他们是全球革命主义者。^① 他们逃离迫害他们的旧世界，目的是要在美国建立这个理想中的宗教领地，也就是他们的“新耶路撒冷”。但与遵从圣经教旨的犹太教徒所不同的是，他们期待着某一天他们可能回到改革后的埃及，他们希望这一天并不遥远。清教徒并不是试图永远脱离这个旧世界，他们“在荒郊旷野中开拓事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向大西洋彼岸发起反攻的基地。他们与上帝结成的特别誓约不是将自己绑在这块北美大陆上。^② 美国不是清教徒的“乐土”，而是临时的避难所。^③ 上帝“派人到新英格兰来”是要加快英格兰和苏格兰改革的步伐。^④ 正如伟大的清教徒思想研究学者佩里·米勒（Perry Miller）在许多年前曾经说过的，“清教徒移民并不是要从欧洲撤退：这是一个迂回进攻”。“在1630年的使命中有一个不言而喻的重大假设”，那就是在新英格兰的成功将意味着返回旧的英格兰。^⑤

马萨诸塞湾的殖民者既不是试图脱离旧世界，也不认为自己是

-
- ① 孤立主义可能一直是1620年到达朴次茅斯的那些“独立分子”追求的目标，而不是10年后才到来的那些温索普式的清教徒追求的目标。
 - ② 如佩里·米勒所写的那样，“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服侍上帝，马萨诸塞只是大家可能聚集在一起的便利（虽说不是非常便利）的平台”。Miller, *The New England Mind: From Colonies to Provi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25.
 - ③ 清教徒的先人们“不是寻找天堂的难民——尽管他们的遭遇与摩西和以色列部族相似，不过，英国学者、士兵和政客长途跋涉来此，目的是有一天他们或者他们的孩子们或者至少是他们的朋友能够在朗伯斯（Lambeth）得到统治权”。Ibid., p. 5.
 - ④ Ibid. p. 7.
 - ⑤ Perry Miller, *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II. “如果宗教上的动机得以实现，那么不仅耶和会保佑这片新土地，而且他还会支持这些临时的殖民者去管理英格兰。”



孤立的。^① 清教徒领导人甚至不相信他们正在建立的“新”世界与旧世界有什么不同。在他们的脑海中，新英格兰和旧英格兰是同一个世界，如果不是地理上的，那也是精神上的。在温索普定居下来的 100 年后，传道清教徒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曾说过“我们的国家”，他所说的这个国家包括英国和英国人的北美殖民地。从这里可以看出，新英格兰清教徒一点也不想与旧世界脱离关系，最让他们失望的是，17 世纪中期英格兰的清教徒革命放弃了清教徒的榜样——教规严格的加尔文主义，这才导致清教徒在神学教义上孤立地存在于他们的美国旷野之上。^②

反过来讲，对于温索普及其追随者这样的清教徒来说，他们梦想建立的美国并不是一片乐土，而是他们的墓地。清教主义死亡的部分原因是，美国的旷野就像圣经里的以色列一样，是一块流着奶和蜜的土地。这个新世界对于鄙俗禁欲的清教徒来说实在太辽阔了，他们僵化的僧侣政治需要的是控制、服从和自我克制，但不断扩大的北美荒野带来的却是自由、异见、独立和对土地的欲望。对于各种社会身份的男女来说，富足的土地和大量的经济机遇造就了太多从神明到世俗层面的不同思想。它破坏了宗法等级制度，也动摇了正统观念。一些不喜欢加尔文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定居者只好向上搬到康涅狄格河谷居住。在温索普到来之后的 12 年里，清教徒传教士一直在谴责其教区居民为了在“新世界”获取更多的“行动自由”而出现的罪恶欲望。“土地！土地！这已

① 这和吉尔伯特的看法不同，他认为清教徒的乌托邦使命“推动他们割裂与欧洲事务的联系”，他们“要在新大陆引领更美好生活的希望形成了反对卷入欧洲事务的意识”。Gilbert, *To the Farewell Address*, p. 4. 米勒这样写道，“孤立主义不是一个距离或者交流缓慢的问题，而是一个远方急报对于接受者意味着什么问题。一份来自日内瓦、法兰克福、斯特拉斯堡或者莱登的报告可能要花上数月才能到约翰·柯顿（John Cotton）或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r）的手上，但是，不管是否能及时得到理解，它都不是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传说，而是一件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事情”。Miller, *New England Mind*, p. 6.

② 米勒写道，“使温索普苦恼的不是新英格兰的建立失败了，而是英国同胞没有吸取教训”。Miller, *New England Mind*, pp. 8 - 9.



经成了许多新英格兰人顶礼膜拜的东西”，因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慨叹道，“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抛弃了教会和圣餐仪式，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新世界得到尽可能多的土地和行动自由”。^①

北美的富饶土地也释放了新教制度的自由和唯物主义的力量，新教不仅绝对压倒了清教徒前辈们最初的神教观，而且使新英格兰走上了英美文明其他部分已经走上的新道路，即走向个人主义、进步和现代化。由于在新世界中有着许多个人致富的机会，得到劳动报酬被视为得到上帝青睐的证据，在一个人的“天职”中辛勤工作是被拣选的标志，这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的“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也成为物质进步的强大引擎。在短时间内，移居者、种植园主，以及波士顿地区日益富裕和强大的商人——被称为“河神”（River Gods）——都来参拜加尔文主义圣父和圣祖之外的圣坛。自由是这些新贸易集团的商业风气，它代表的是一个新时代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指导原则并不是感觉上的社会稳定、秩序和纪律，而是流动性、发展和对生活的享受”。^②

到18世纪初，在信奉清教的新英格兰也已经形成了盎格鲁—美洲地区的“新兴的世俗和商业文化”。新英格兰人“放弃了他们建立山巅之城的宏伟理想”，而清教主义本身也融入了新的、现代化的社会中。^③从18世纪初初期至中期，被冠之为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宗教复兴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清教主义的失败，这是一种对美国社会日益世俗化，以及对在殖民地精英人群中不断蔓延的基督教理性主义和自然神论的焦虑性反应。乔纳森·爱德华兹感

① 米勒写道，“使温索普苦恼的不是新英格兰的建立失败了，而是英国同胞没有吸取教训”。Miller, *New England Mind*, pp. 36–37.

② Bernard Bailyn, *The New England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39–42.

③ Jack P. Greene, *Pursuits of Happines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Early Modern British Colon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pp. 195–96.